

# 寻找逝去文明 再现昔日辉煌

## ——安家瑶先生访谈录

◆ 安家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安家媛

(中国国家博物馆)

心  
路  
历  
程  
薪  
火  
相  
传

作为姐妹,又是同行,自认为我对姐姐安家瑶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成果是有所了解的,但仔细一想,我对她的这些了解都是零散的,也不够系统。感谢《南方文物——心路历程 薪火相传栏目》的邀约,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姐姐坐下来,详细聊聊她的考古人生。

**安家媛:**受父亲安志敏先生的影响,我们姐妹俩都选择了历史和考古学专业,并成为一生的职业,但我们俩受父亲影响的方式又不尽相同。很想知道你最初是怎样接触到考古的?父亲又是如何引导你走向考古道路的?

**安家瑶:**我们的父亲是考古学家,母亲张裕珠是医生。家里四个孩子,我排行老二,你最小,比我小10岁。老大安家琦,从小动手能力很强,后来成为食品业的工程师。老三安家傲从小对历史考古有兴趣,去内蒙古插队做了赤脚医生,后来学了医学(图一)。我懂懂的少年时期,只知道父亲是搞考古的,而且我把考古和下田野发掘联系在一起。因为那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之初,父亲每年大部分时间是在河南做田野发掘,回到家里他多数时间也是伏在案头整理考古发掘的资料,写考古研究的文章,很少有时间陪我们玩,那时我只是觉得考古很神秘。

第一次实地接触考古,是在1961年我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父亲带我去大连看望祖母和你。名曰探亲,实则是父亲想对烈士山和小磨盘山中的贝丘遗址进行考察。他数天在周边的小山上踏查,甚至带着我进行了

一次试掘。那天我和父亲带着铁锹、小镐头等工具上了山,在山上足足待了一整天。父亲一会儿挖,一会儿掏出小本子记笔记,忙得不亦乐乎。那天的太阳很足,没有一点儿风。我在旁边只是递递工具,也是汗流浹背,带来的一壶水早就喝光。那次田野考古留在我记忆里的只是口渴,那时年幼,还不能完全理解父亲在做什么。后来才知道父亲发表了《记旅大市的两处贝丘遗址》,为我国的贝丘考古奠定了基础。

1962年夏天,中国科学院组织一批专家赴内蒙海拉尔休养。回来时父亲来信要我们去火车站接他。那时我国还是处于困难时期,我们兄妹几个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经常吃不饱,我们盼望父亲从海拉尔带回些好吃的。火车站上人很多,回来的专家们都带了不少大包小箱。拿现在的眼光看,他们的大包小箱中也没装什么好东西,只是海拉尔的特产——土豆。可是在当时,土豆也是在北京难以买到的可以填饱肚子的好东西。父亲的纸箱格外沉,回家后一打开,却让我们失望。箱子里装的全是不能吃的石器(后来这些石器全部交到所资料室)。父亲利用那次休假,对内蒙海拉尔松山细石器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后来,父亲发表了《海拉尔的中石器——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这篇论文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有一件事至今想起来还很愧疚。1966年夏,我高中毕业,那年我参加了清华大学的一个长征队,准备从北京走到延安。父亲知道我要走山西,便嘱咐我路

上注意有没有石器和陶片。当时我们每天背着几十斤的行李和宣传品，迈开双脚走七十八里路，晚上到了村子里，还要开会，早就忘记了父亲的话。现在想起当时走的路，很多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刚刚沿山开辟的战备公路，路边的断崖上肯定能发现古人活动的遗迹和遗物。由于当年的幼稚，错过了那次考古发现的好机会。

也许有人好奇，会问我们姐妹都从事考古，是不是跟父亲的有意培养有关，其实还真不是。在对待子女的教育上，父亲从来都不多干预，更没有强迫，一切都凭我们自己的兴趣和志愿。但父亲热爱考古，孜孜不倦，身体力行，全力以赴地从事考古事业，对我来讲是有影响的，是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当然，父亲对我们能从事考古工作还是很高兴的（图二）。

我最初的人生理想并非是要搞考古。我的中学是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的，高中分文理科时我选的是理科班。在班上我的化学成绩好，对学习化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当时的理想是要成为一名科学家。之所以选择理工科也是因为受到了姑姑安静娴的影响。姑姑曾是东北制药总厂的一名工程师，她终身致力于药学研究，后来成为唯一一名从制药厂走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图三）。我上高中时新中国百废待兴，科学事业刚刚起步，姑姑的奋斗历程让我意识到，国家要强盛，就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在这样的信念激励下，我当时的梦想是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然而，在1966年6月，当我高中毕业准备参加高考时，高考制度被取消了。在随后的十年间，我参与知识青年下乡，辗转于祖国的北大荒和大西北。待我再回到北京时，已经很难拾起阔别十年的理科。一系列的人生波折让我与理工科失之交臂，当恢复高考制度后，我已经年过三十岁了，我决定直接报考考古研究生。当然也得益于家中的考古书籍，让我可以自学考古，补上大学本科考古的一些基础知识。在父亲及亲朋的支持和鼓励下，我考上了宿白先生的研究生，从此和考古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2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专业毕业，随后便进入考古研究所的西安唐长安城考古队工作，这一干就是三十余年。走上考古之路，可以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安家瑶：**你有幸成为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的研究生，三年的学习中，你跟宿白先生学到了哪些治学方法和理念？宿白先生在授业解惑中，给你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

**安家瑶：**1979年秋，我有幸成为宿白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刚入学时，与79级新生听了苏秉琦先生的讲话，他说你们就像候鸟，春秋飞出去了，夏冬又飞回来



图一 1968年全家照



图二 1991年父女三人在考古所门口



图三 姑姑安静娴在实验室

了。我们都对考古实习充满喜悦和幻想。1980年初，我和同学陈英随先生在武昌湖北省博物馆实习。当时宿先生的助教权奎山和湖北省博物馆的全锦云正在整理武昌郊区隋唐墓，为了寻找墓中出土瓷器的来源，宿先生带我们到湖南、江西考察窑址。我们最后一站是从九江乘轮船回武昌。我和陈英央求先生给我们半

天假，让我们上庐山看看。庐山不仅是近现代史上的很多重要事件的发生地，而且当年《庐山恋》刚刚上演，这是刚改革开放拍的最有影响的电影。宿先生没有答应我们的要求。通过这件事，我们明白考古不是游山玩水，再也不向先生提出这类无理要求。

1981年暑假，我们跟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实习一个多月(图四)，名胜地月牙湖就在附近，我们也没有去游览。后来我到考古所工作，才知道夏鼐先生对本所考古工作者的要求更为严格：直接去考古工地，中途不得下车。直到80年代，这项规定才稍稍松了一些，沿途可以下车进行业务考察。

做研究生时，我们跟宿先生出去考察，一般都是在单位食堂吃饭，有时就是简单地吃两个馒头。1981年夏，随先生考察炳灵寺。当时炳灵寺交通不便，早上不到六点就从兰州出发，到刘家峡后，乘小船抵达石窟。考察石窟爬上爬下，不到中午早已饥肠辘辘。当时的现场没有食堂，更没有饭馆，炳灵寺保管员给先生和我们每人下了碗白水挂面填饱肚子，我们继续工作。

宿白先生对公款吃喝非常反感，有一次在湖南的小县城，地方官员为我们准备了一桌酒菜。拿现在的目光，算不上奢侈，也就是有鱼有腊肉。因为有当地文物工作者陪同，宿先生不好拒绝，事后宿先生对我们严肃地说：“这样吃喝不好，这都是民脂民膏啊！”先生的话为我们后来走向工作岗位警惕乱用公款敲了警钟。

宿先生反对用公款吃喝，但自己出钱请学生吃饭却十分大方。在武昌东湖实习时的一个周末，先生掏钱让我们买螃蟹，在全锦云家蒸熟，请我们吃，并一步一步教我们怎么吃螃蟹。

跟随先生久了，才渐渐明白他的苦心：考古是一项极其严肃的事业，只有培养出自律、认真的工作态度，才有可能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关于考古学的方法论思想，宿老师对我也有深远的影响。他曾反复向我们强调，做考古既要重视田野作业，也要重视文献研究，这两项是历史考古学研究的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只有在考古遗迹发掘的结果与文献记载相符时，研究成果才能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该如何学习、如何调研、如何进入工作状态，先生很少谈起，他对我们的教诲与熏陶，都凝结在日常的点滴中，这大概就是如春雨般润物于无声吧。宿白先生对田野考古的热爱和执着也使我难以忘怀。2013年北京房山区长沟镇发现一座大型唐代墓葬——刘济墓，先生到现场坚持下到墓室(图五)。那一年先生已经91岁高龄了。

安家瑶：你研究生毕业论文是《中国古代玻璃器》，后来又做过相关研究，你为何选择这个论文来做？能介



图四 1981年夏与宿白、王永兴先生在敦煌



图五 2013年宿白先生在刘济墓

绍一下你对中国古代玻璃的研究成果吗？玻璃器在古代丝绸之路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安家瑶：考研究生之前，我曾在甘肃师范大学脱产学习了一年的英文。出于理工科所崇尚的科学精神，加上我对东西文化交流史的兴趣和有一定的英文基础，我选择了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作为主攻方向，因为这个历史时期不仅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还有众多文献可考，可以让我的研究在最大程度上“有据可依”。而在玻璃考古上，我的理工科背景也有用武之地。作为一种人工材料，玻璃的成分对于弄清玻璃来源及性质有重要的指示作用。对玻璃成分进行化验检测，会涉及大量的化学知识。如此一来，我的理工基础便和考古很好的结合了起来。

在父亲的建议和宿白先生的鼓励下，我把《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作为我的研究生论文题目，在搜集中国古代玻璃器资料的同时，对世界古代玻璃器的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研究。父亲的建议和他1950年在河南辉县发掘固围村战国墓出土玻璃蜻蜓眼、1951—1952年在长沙发掘战国两汉墓出土蜻蜓眼有关，后来他在国外看到相似的玻璃珠，就有研究探讨两者之间关系的想法。宿白教授一直对中西交通有研



究,1980年代初访问过伊朗,给我们开过中外交交通考古的课程。我选玻璃器作论文题目,宿先生很赞成,还建议和我同级的研究生陈英英做金银器的题目。我国对古代玻璃研究的人不多,成果也有限。1984年我的这篇论文在《考古学报》发表,就引起国内外同行的关注。该文被大英博物馆M. Henderson翻译成英文,由伦敦东方陶瓷协会出版成书《Early Glassware》(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no.12 c.1987)。之后,我国陆续发现了不少新的古玻璃资料,特别是伊朗高原的萨珊玻璃的考古发现,和法门寺地宫20件伊斯兰玻璃的出土,我的研究也随之深入。

世界上最早的玻璃诞生于公元前25—23世纪的两河流域,晚于铜器,早于铁器,这是学界已达成的共识。关于中国玻璃的起源,虽然学界目前尚无定论,但从考古出土的玻璃器可以看出,自战国到北宋,我国一直存在着两类不同系统的玻璃制品:进口玻璃和国产玻璃。从成分上来说,西亚的玻璃多用苏打做助熔剂,称之钠钙玻璃。而中国在历史上大概是缺少自然纯碱资源,所以国产玻璃多以氧化铅作为助熔剂,生产出来的是铅玻璃。

“蜻蜓眼”是研究中国玻璃起源的一条关键线索,它是一种源自西亚的镶嵌玻璃珠。玻璃珠饰在西方曾经历过漫长的发展阶段,而中国的蜻蜓眼和其他玻璃制品都是在春秋末期同时出现的,目前没有考古证据表明我国玻璃在此前有过发展过程。我们在中国发掘出的最早的蜻蜓眼和其他玻璃器的主要成分是钠钙玻璃,这就暗示着它们应该是舶来品。战国中期,玻璃蜻蜓眼和其他玻璃器在中国大量涌现,在成分上多为铅钡玻璃,它们应该是我国匠人对于西亚玻璃器的仿制品,这意味着当时已经可以制造玻璃器。

尽管中国玻璃的诞生很可能是受到了西亚的影响,但国产玻璃并不是对于西亚玻璃的单纯仿制,它具有很强的传统文化印记,在同时期的陶瓷器或漆器中可以找到相似器型。比如出土于汉代刘胜墓的玻璃耳杯,就是典型的中国器形,与器形相同的漆耳杯一样,是汉代墓葬中最普遍的器物,而国外就没有这种器形的器物。西安郊区隋代李静训墓出土的玻璃蛋形器也是我国独有的器形,国外没有同类的出土物。北魏的玻璃葫芦瓶以及北宋大量出土的玻璃葫芦瓶都可以说是我国独有的创意,因为葫芦是我国最早驯化的作物之一,我国出土物中就有不少葫芦形的瓷器,但国外葫芦瓶的器形却很罕见。综合来看,我国古代的国产玻璃工艺自成体系,浓缩了独特的中国传统审美,是世界玻璃史上的一抹亮色(图六)。

我们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考古发掘中,都发



图六 2015年与樊锦诗考察遵义杨价墓出土的玻璃杯

现了大量制造于战国时期的国产玻璃蜻蜓眼和管饰,它们尺寸较大,色彩艳丽,并且“眼”纹饰从同心圆变成了偏心圆,与不同的几何图案结合形成了更丰富、复杂的纹饰,这在外观上比西方同时期的蜻蜓眼更加美丽生动。

从考古实物的出土地点及出土数量来研究古代东西交通的路线,是研究东西交流史的一个重要领域。作为历史上最受欢迎的贸易品之一,传入我国的玻璃器为东西文化交流的路线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近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玻璃器越来越多。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五世纪,罗马玻璃繁荣发展,这时期正值我国两汉魏晋南北朝。这时,我国出土的外国玻璃器主要是罗马玻璃。汉代时期出土的进口玻璃集中在广东、广西、江苏等沿海地区,这与《汉书》中记载的汉武帝曾“使人入海市璧流离”相符。公元前1世纪的一位希腊人周航红海、波斯湾、印度半岛东西两岸,写下《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书中记载了中国的位置和物产,也记载了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器东运的情况。众多出土实物与文献都说明两汉时期进口玻璃器多由海路输入中国。这也证明,最迟在汉代,东西两大文明间即存在着海路交通。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东西之间依靠陆路交流。西晋诗人潘尼在《琉璃碗赋》中写道:“览方贡之彼珍,玮兹碗之独奇,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其由来也阻远。”这清楚描写了玻璃碗通过丝绸之路进入我国,而新疆出土的罗马玻璃残片也印证了这一点。此外,北魏时期,出现了一批采用吹制成型的国产玻璃容器,与汉代流行的铸造成型的铅钡仿玉玻璃截然不同。这一新的玻璃成型工艺的采用,与东西文化

技术交流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

魏晋南北朝、隋代进口玻璃器除了罗马玻璃，还有萨珊玻璃。萨珊玻璃是指萨珊王朝（226—651年）时期伊朗高原生产的玻璃器。罗马帝国衰败后，罗马的玻璃业也衰败下去，很多技术没有保留下来。这时玻璃业的中心转到了伊朗高原的萨珊王朝。公元3—7世纪伊朗进入萨珊时代，继承了罗马玻璃技术，但有自己的特点，造型古朴，喜欢用连续的小圆形作装饰，冷加工雕塑和热塑都发展得比较好。北京西晋华芳墓出土的玻璃碗有突起的乳钉，还有用镊子捏出的小凸起。日本的奈良正仓院藏白琉璃碗，表面有成排的圆形磨饰，圆饰都是凹球面，这是萨珊玻璃通过中国又到了日本。新疆出土的萨珊玻璃残片及敦煌壁画上磨花玻璃的画面，都是萨珊玻璃经过丝绸之路输入我国的证据。

我国唐代、宋代主要进口的是伊斯兰玻璃，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20件精美玻璃器，河北定县五号塔基出土了8件进口玻璃器，内蒙古奈曼旗陈国公主驸马墓出土7件玻璃器都是伊斯兰玻璃的精品。中国发现的伊斯兰玻璃器数量多，有可靠的年代和出土地点，中国已经成为产地之外的最重要的伊斯兰玻璃发现地之一。中国考古出土的伊斯兰玻璃不仅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证据，而且对于伊斯兰玻璃的研究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我国出土的罗马玻璃、萨珊玻璃、伊斯兰玻璃等器物，以及国产玻璃制造技术的演进，不仅反映出玻璃器与玻璃技术是由西向东逐渐传入中国的，也验证了世界玻璃史的演进过程。玻璃虽小，却能折射出东西文化在丝绸之路之上交流碰撞的璀璨光芒，这正是“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安家瑶：**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的玻璃器似乎不及西方玻璃器的发展，西方最早将玻璃用于望眼镜和显微镜等科学实验的器械，中国却在这方面有所欠缺。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安家瑶：**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回顾一下玻璃用途的演变史。在其诞生之初，玻璃仿造青金石、绿松石等宝石，多为不透明或半透明的，而且造价高昂。因此，在罗马帝国之前，玻璃器都是一种仅供贵族阶级享用的奢侈品。《旧约·伯约纪》第28章提到：“黄金和玻璃不能与智慧相比”，可以知道在圣经成书的年代，玻璃的价值是与黄金相提并论的，足以见其珍贵。

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玻璃吹制法问世，大大简化了玻璃生产，降低了成本。从此，玻璃的用途开始分化，一部分依旧被用来制作成贵族享用的奢侈品，它们造型精美，工艺繁缛，不计成本；另一部分则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成为地中海地区常见的生活用品，比如香水

瓶或餐桌上的器皿。同时，透明玻璃制品也日渐增多，这就为玻璃日后走入光学领域奠定了基础。

伊斯兰阿拉伯在公元7世纪兴起，很快占领了地中海东岸和伊朗高原上原属于罗马帝国与伊朗萨珊王朝的两个玻璃制造中心，并进一步改进与提升了玻璃制造技术。当中世纪的欧洲还在黑暗中苦苦摸索，伊斯兰阿拉伯的人们已经将玻璃器应用到光学实验和化学实验当中，在世界科技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到了公元13世纪，威尼斯玻璃兴起，继承并发展了伊斯兰玻璃的制造工艺，而我们使用的现代玻璃，就是从威尼斯玻璃发展而来的。

回到中国的玻璃史，我国早期出现的玻璃，多是进口的玻璃。因其昂贵罕见，属于土族大户的斗富之宝。在进口玻璃的刺激下，中国工匠开始可以用当地的原料生产玻璃。总体来说，中国的玻璃是以铅玻璃为主，仿玉制品为多，没有发展玻璃实用品，以观赏品、宗教用品为主，颜色鲜艳、壁薄易碎。我们没有发展玻璃实用器，可能跟我们的瓷器产量很大、经久耐用有关系。通过对比玻璃在中外的发展史，不难发现，玻璃在西方很早便进入实用领域，而且伊斯兰率先将其应用在光学、化学研究上，因此玻璃能够成为西方近现代科技发展的重要助力。而在古代中国，出于原料、工艺上的限制，玻璃始终没有发展成我国主要手工业之一，也没有在科学史上发挥作用。尽管如此，我认为古代中国的玻璃制造还是有其自身的特点，古代中国人出于对审美的追求，对玻璃艺术品的制作精益求精，比起西方同时期的玻璃艺术品，其造型设计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安家瑶：**你1982年进入考古研究所后，一直在考古所的西安唐长安城考古队工作，主持过多项隋唐遗址的发掘，你对隋唐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主要贡献都有哪些？请重点介绍一下几个重要遗址的发掘经过和难忘的经历。

**安家瑶：**研究生毕业之后，我留所成为西安唐长安城考古队的一员，并一直在考古队干到退休。我能坚持田野工作，与母亲张裕珠默默的支持帮助是分不开的。也和我先生曾祥龙的理解和宽容是分不开的（图七）。

唐代是我国政治统一、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国际交往频繁的盛世。长安城作为唐代的都城，人口一度超过百万，是中世纪的世界名城。1957年以来，马得志、卢兆荫等老前辈带领唐城考古队对这座城址进行了全面勘察和多次发掘（图八）。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基本探明唐长安城的形制、布局及历史沿革。

我到唐城考古队后参加了大明宫东朝堂、翰林院、唐长安城西明寺等遗址的发掘。1989年我从马得志先



生处接班任唐城队队长，主持了西明寺第二次发掘、麟游县隋仁寿宫唐九成宫37号殿址、唐大明宫含元殿第二次发掘、唐长安城圜丘、唐长安城西市、唐大明宫太液池、唐大明宫丹凤门、唐长安城西市遗址等的发掘。

这些发掘有惊喜也有苦涩。隋仁寿宫唐九成宫37号殿址是1989年在基建中发现的。在省市县各部门支持协助下，考古队经过5年的艰苦工作，多次拆房扩大发掘面积，于1994年9月完成了整个殿址的揭露（图九）。37号殿址的揭露，给考古学界和古建筑界带来了惊喜。37号殿址位于离宫中心偏东部，殿址坐北朝南，高出隋唐地面1米，东西长42.62米，南北宽31.72米。黄土夯筑的殿阶基全部用石材包砌。东、西、北三面各有两条与回廊相接的踏道；南面设两条登殿的踏道，踏道中间有0.91米的石阶为“陛”，即皇帝专用的御道。殿址上现存64个一米见方的覆盆式青石柱础，雕刻得非常规整精细。由于绝大多数的柱础都在原位置没有移动过，因此该殿堂的平面布局相当清楚：东西面阔九间，南北进深六间；网柱分布独特，檐柱与内柱之间形成跨度达8.2米的围廊，如此之宽的围廊为国内首次发现。遗址中部为内殿，面阔五间，进深二间，南北跨度达9.4米。内殿的南北门还留下了汉白玉的门砧石（图一〇）。

这样格局的建筑在文献中未见记载，现存古建中也无此类实例。37号殿址的考古发掘填补了中国建筑史上隋代宫殿建筑的空白。1994年9月初，麟游县召开了九成宫37号殿址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宿白教授、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罗哲文先生、九成宫前期考古发掘的主持人马得志先生及国家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宝鸡市广播电视文化局的领导等考察了考古现场（图一一）。专家们对保存这样好的隋代宫殿赞叹不已。宿白教授认为：这个遗址是中国考古史上保存最完整、最系统的皇家离宫遗址。罗哲文先生背着相机兴奋地四处拍照，中午也不休息，不顾劝阻，登上37号殿址南侧邮电局新楼的楼顶拍遗址，以至于会后还没有到西安就发起高烧。我们都因照顾不周有所愧疚，但罗先生并不在意，一提起九成宫仍兴奋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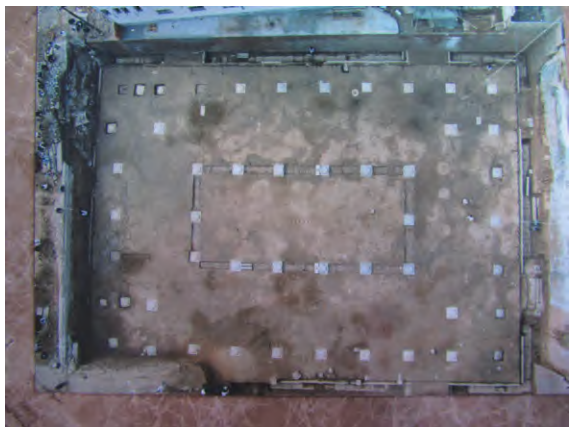
37号殿址的发掘被《中国文物报》评为1994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1996年，这一考古工作又被《中国文物报》评为“第八个五年计划（1991—1995）”期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同年，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发掘的成果令人兴奋，但是回忆起发掘的五年过程还是痛苦的。我们在1993年秋已经完成扩方，准备来年揭露出整个殿址



图七 2017年与曾祥龙去看望宿白先生



图八 1992年与马得志先生在西明寺发掘工地



图九 仁寿宫九成宫37号殿址鸟瞰



图一〇 内殿的门砧石和柱础



图一一 专家们考察37号殿址

时，县邮电局1993年冬趁我们不在现场，在距离遗址仅两三米的地方盖起一座四层的楼房。1994年我们到现场时，看到的场景真让我们欲哭无泪。这座楼影响了37号殿址的保护展示，遗址至今还只能掩埋地下。

唐长安城西明寺遗址发掘也是很重要的发掘。西明寺是唐长安城的四大佛教寺院之一，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到长安后，将佛经藏于大慈恩寺，也就是大雁塔，而他译经和讲经多在西明寺。可以说，西明寺是唐代佛教的中心。

到20世纪80年代，西明寺遗址范围内只剩下一小部分是农田，还没有被现代建筑占据。1985年西安市供电局买下遗址上农田的一部分，准备修建白庙变电站，我队根据刚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力争到在基建动工前进行考古发掘的机会（图一二）。1985年配合白庙变电站基建第一次发掘西明寺遗址，发掘面积7500平方米。1992年夏季西安市房地产公司将西明寺遗址范围内的最后一块空地征购下来，准备盖居民楼以改善西安市民的居住条件。我队在基建动工前对西明寺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掘面积近7500平方米。通过这两次发掘，特别是大



图一二 西明寺遗址第一次发掘鸟瞰

量佛教遗物的出土和刻有“西明寺石茶碾”铭文的石碾的出土，充分证明西明寺遗址的存在（图一三）。我们只发掘了西明寺遗址的八分之一，但也发现了寺东部的三进院落、三座主要建筑和回廊等。遗憾的是考古发掘后，这个重要遗址没能保存下来。

日本奈良佛教与唐长安西明寺的关系密切直接。留学僧道慈于日本大宝二年（702年）入唐，养老三年（719年）归国，在华十八载，主要在长安学习生活。他回到日本时将西明寺的图纸带到日本，并按照图纸建造了奈良的国家大寺——大安寺，至今还保留了大安寺一部分（图一四）。很多日本友人来西安寻找西明寺遗址，但遗址已淹没在现代建筑下，没有保留下痕迹。古迹遗址是历史的载体，一旦破坏，不可再生。作为西明寺遗址的发掘者，没有能够将遗址保存下来，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大明宫含元殿遗址的第二次发掘是影响比较大的考古工作。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确立了合作保护含元殿遗址的项目，我主持含元殿遗址的第二次发掘（图一五）。发掘中有争议的问题是龙尾道的位置。

龙尾道指的是坡度陡而长的一种坡道。元人胡三省在《通鉴》注中解释说：“筑建坡坨以上的城，其道下附于此，若龙垂尾然，故曰龙尾。”文献中龙尾道一般与城墙相关，与正殿相联系的龙尾道只有唐大明宫含元殿。在含元殿第二次发掘之前，受故宫太和殿形制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龙尾道应该有三条，包括左右供百官登殿的台阶，和中间专供皇帝走上高台大殿的御道。在各类文艺作品中，唐代的皇帝也是在文武百官的夹道恭迎中，通过大殿前正中间的御道，徐徐登上大殿。然而，大明宫含元殿的考古发掘却颠覆了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

我们找到了未曾破坏的唐代地面和一层大台南



图一三 西明寺石茶碾





图一四 日本奈良大安寺



图一五 含元殿考古发掘



图一六 宿白教授等专家在大台南壁现场检查

壁的包砖和散水，包砖与散水基本连成一线，未发现从南面正中通往大台的痕迹，因此，龙尾道设在殿南正中已不可能。我们在栖凤阁阁下墩台的东侧，发现一段坡道，叠压在第3层堆积之下，不晚于北宋。与这条坡道相对称的第一层大台东部的南伸部分被国民党时期的战壕破坏殆尽。根据考古发掘的结果，结合唐代、北宋文献中关于“左右龙尾道”的记载，我们认为含元殿的龙尾道起自殿前广场的平地，沿两阁内侧的坡道，经三层大台，迂回登到殿上。宿白教授等专家

都到现场检查(图一六)，最终学术界认可了我们的推断，即唐大明宫含元殿前的龙尾道只有两条。之前我们一直以为的位于中间位置、供皇帝行走的御道，在唐代其实是不存在的。这个结论也更新了我们对于唐代皇帝上朝礼制的认识。唐代皇帝的寝宫在含元殿的北面，所以皇帝上朝是从含元殿的北门进殿，而且仪仗中有“索扇”制度，即由宫人举仪仗扇遮挡住皇帝，目的是不让文武百官看见皇帝。待皇帝在龙椅上坐端正后，扇子才会被收起来，称为索扇。这种设计的目的是营造出皇帝的神秘感，凸显其至高无上的权威。

含元殿龙尾道的形制不仅影响了我国边疆地区民族政权，也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建于公元698年的渤海国曾深受唐朝文化影响，它的都城上京龙泉府就承袭了唐长安城的形制与布局。龙泉府宫城的第一座大殿相当于含元殿，坐落在火山石砌成的大台上，上殿的通道也是砌在大台的左右两边，彼此相隔很远。

作为与大唐帝国交流频繁的国家之一，日本的一些古建筑中也能找到龙尾道的痕迹。平城宫第一次大极殿建在院北高地“龙尾坛”上，院子南部三分之二的宽阔地方为殿前广场。“龙尾坛”高出南部地面2.2米，砖砌拥壁，与含元殿大台相似。值得注意的是，广场北部也呈凸字形，左右两侧设坡道迂回上殿，与含元殿龙尾道十分相仿。在发掘含元殿时，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所长町田章先生到现场回忆他在发掘平城宫第一次大极殿时，发现了殿前大台左右两侧迂回上殿的坡道。这一发现受到了日本建筑学界的质疑：皇帝该如何上殿？当时日本学界甚至有人提出了皇帝从木质御道上殿的假设。含元殿龙尾道的研究结果公布后，町田章先生十分高兴，因为这就解释了平城宫第一次大极殿的龙尾坛形制是仿唐含元殿建造的(图一七)。

**安家瑶：**大明宫是世界上最大的宫殿群，通过你的考古发掘你对盛唐时期的这些建筑有怎样的感受和想象？

**安家瑶：**考古工作的严肃性要求我们对于古建筑的所有推断都必须有实实在在的考古证据支撑，不可以任意发挥想象力。但是，站在发掘现场，还是能够感受到大唐盛世的气象万千。

盛唐文化的特点是包容开放，这种心态反映在建筑上，就是雄伟与开阔，大明宫面积相当于故宫的4.5倍。作为大明宫的前朝第一正殿，含元殿是当时唐长安城内最宏伟的建筑，它坐落在10.5米高的大台上，这比故宫三大殿的台基都要高(图一八)。如果在唐代，站在含元殿前南望，不仅能将丹凤门与广场尽收眼底，还可以看到城南的大雁塔。含元殿的东西两侧分别是翔鸾、栖凤二阁，阁下长长的龙尾道蜿蜒而上，直到三层



台基之上。史料中曾记载，因为含元殿龙尾道坡长阶高，八十一岁的柳公权在走过龙尾道后精疲力竭，听错了皇帝的尊号，被罚去一个季度的俸禄，龙尾道之长可想而知。含元殿是大唐皇帝举行重要的典礼仪式、接待外国使臣的场所，所谓“千官望长安，万国拜含元”“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就是描写含元殿大朝会的盛况。可以想象一下，每逢大朝会，文武百官列队穿过长长的龙尾道，最终登上含元殿，这个过程仿佛是通往天上宫阙。如今我们站在含元殿高高的大台上向下俯瞰，还是能够感受到唐代辉煌的气势。值得一提的是，大明宫绝不像文艺作品中描绘的那么花哨。我们虽然发掘出部分琉璃瓦，但是这类瓦片数量很少，大部分出土的瓦都是黑色的青棍瓦，少量琉璃瓦用于镶边。这就说明，不同于金碧辉煌的故宫，大明宫展现出的应该是一种古朴雄浑的气质。此外，发掘结果显示，大明宫内应该比较空旷，不像故宫内的建筑这么密集，这也印证了唐朝纵横捭阖、磅礴豪放的“大美”气象。

**安家媛：**含元殿发掘后你们唐城考古队在大明宫内还有哪些重要发掘？

**安家瑶：**2000—2004年，我们考古研究所与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大明宫太液池进行了六次考古发掘，收获了许多重要发现。清理出来的池边干栏式水榭和廊道建筑遗存，极大丰富了我们对于唐代皇家园林建筑形式的认识。出土的透雕龙纹石栏板和带莲花座的蹲狮石望柱是最高等级的建筑构件，为唐代考古所首见，展现出唐代辉煌的建筑风采。值得一提的是，池底淤泥中首次大范围清理出荷叶莲蓬的遗痕，还有许多保存完整的大小螺壳。站在昔日的太液池边，记起白居易的“太液芙蓉未央柳”，当年那个荷叶接天、鱼螺潜底的一汪碧水似乎又在眼前荡漾。

2005年我们发掘了大明宫最重要的南门——丹凤门。丹凤门五门道的格局是发掘前没有想到的。

我60岁后，唐城考古队交到龚国强博士手中（图一九）。他带领考古队在大明宫内发掘了中书省等官署遗址。在唐代，长安城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贸中心。它设计周详，布局井然。以坐落在城北的宫城为核心，宫城、皇城、郭城渐次展开。商业活动主

要集中在当时郭城内的东市和西市。东市由于距离大明宫较近，以售卖马具、官服配饰为主。西市更加平民化，胡商众多，因此也更为热闹。不少文人骚客留下墨宝，描述了当年东、西两市商贾云集、人声鼎沸、商品琳琅满目的繁盛景象，比如李白的“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和杜甫的“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我们队2005年发掘了西市的一部分，前些年龚国强队长又带领考古队发掘了东市遗址，另外，隋仁寿宫唐九成宫的4号殿址也有惊人的发现。

**安家媛：**你在大明宫等遗址保护上做过哪些工作？取得了怎样的效果？

**安家瑶：**大明宫遗址在西安火车站的北边，这个地方被西安人称为道北，原是西安的棚户区，居民收入低，治安问题多，环境脏乱差。我记得当年的发掘现场遍布居民的生活垃圾，臭气熏天，而且当时的道北人还将大明宫遗址当作当地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想方设法在遗址上挣钱。大明宫遗址在这种环境中面临消失殆尽的危险。当时的文物保护干部和考古工作者都心急如焚，却束手无策。我们意识到要保住这个遗址必须依靠政府和全社会的力量，所以2004年初我写了



图一七 1994年町田章（站立左二）带奈良文化财研究所考察含元殿遗址



图一八 含元殿保护工程结束



图一九 考古队三代人(由左向右:李春林、龚国强、马得志、安家瑶、何岁利)

一份提案,呼吁抢救大明宫遗址,得到了许多政协委员的支持。2007年10月,西安市政府确定了大明宫遗址区保护和改造的工程项目,全面搬迁和安置大明宫遗址内的居民,并拆除占压遗址的城中村建筑。到了2010年,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终于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成为我国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遗址公园规划建设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想法,如何兼顾与平衡各方的需求与利益,是遗址公园规划建设的关键。丹凤门遗址现在是大明宫遗址公园内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在规划遗址公园时,我们讨论过丹凤门的数个保护方案。我们文物考古人员想按照国际上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建立保护罩或者保护厅,尽量保留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而城市规划部门则看重公园的城市功能,希望公园的景观漂亮,投资融资方关心周围建设的容积率和地价的升值空间,城市管理部门则更多考虑的是公园管理的便利性和其自身的造血能力。经过多次讨论,最后我们达成一致,采用建筑大师张锦秋院士的设计方案,将遗址保护大厅的外观建成仿唐城门楼。张院士巧妙地将保护大厅设计为土黄色,从而与真正的古建筑区别开来。在丹凤门遗址保护大厅的上面,我们还设计了会议厅,增加了这个保护大厅的功能。

大明宫遗址公园也为当地百姓带来了福利。在当地政府的安置下,曾经住在遗址区的简陋棚户里的老百姓不仅搬入窗明几净的新居,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入了遗址公园工作,解决了就业问题。随着公园内景观的不断完善,周围地价也实现了升值。公园内的太液池遗址已经恢复水体,成为城市的绿肺,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从而形成良性的发展趋势。当年我在含元殿发掘时接待过加拿大的学者,跟他谈到大明宫保护的愿景时,他说这将是考古学改变人民生活的例子。真让他说对了。2014年6月“丝绸之路:长安一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成功,大明宫作为其中的项目也进入世界



图二〇 2013年ICOMOS申遗专家Lynn检查含元殿

文化遗产。2013年9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专家Lynn到现场检查,对大明宫的考古和居民的安置表示满意(图二〇)。

遗址一直在受到时间的侵蚀,它不可能永远存在。我们保护遗址就是要延续它的生命,将其受到的人为或自然破坏降至最低。此外,我们希望借助遗址公园这个模式,在保护遗址的同时,还能尽量展示出遗址当年的风貌,给参观者带来沉浸式的体验。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众多古迹遗址都闪烁着中国古代人民智慧与勤劳的光芒,做好遗址保护工作,是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安家瑶:**你担任过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会上,除了提出保护大明宫的提案,你还提过哪些与考古相关的重要提案?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

**安家瑶:**1998年初我被推荐为第九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开启我三届十五年政协委员的生涯。我是一名普通的研究员,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进入全国政协之前没有任何参政议政的经历。政协委员是荣誉,更是责任和使命。如何能不辱使命,不辜负社科院党组的推荐,我必须尽快地进入政协委员的角色。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这三项职能中,参政议政是每一名普通的政协委员可以参与的。人民政协的参政议政是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

我作为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体会是:以自己熟悉的业务为切入点参政议政。我是一名考古工作者,多年在西安从事唐长安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了解我国基本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连绵不断,凝聚着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的,是优秀的文化



传统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国的文化遗产，是光辉灿烂的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载体。每一处文化遗产都是人民了解、认识祖国历史文化的最好课堂，也是激发民族自豪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最好基地。保护好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引导广大民众继承发扬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文化资源。因此，我的提案都是围绕着保护中国的文化遗产。

1998年3月我的第一份提案是关于西安隋唐圜丘遗址的考古发掘和保护展示。1998年初我看到的西安天坛遗址正遭受着严重破坏。天坛遗址呈土丘状，高出现代地面约7、8米，底部呈圆形，直径约60米。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碑立在土丘南侧。土丘上杂草丛生，灌木丛内布满人畜粪便和垃圾，好像在讽刺保护标志。土丘北约10米处，是陕师大近年违章建的自考中心宿舍和垃圾台。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自考中心宿舍和坛体之间，有人在此架棚居住，并在遗址上盘灶做饭，挖洞贮菜。唐天坛遗址当时尚未进行过考古发掘，许多历史之谜有待破解。若不及时改变天坛的保护状况，用不了多少年，这一珍贵文化遗产将从地球上消失。我将唐天坛遗址的状况及时报告给省市文物局，西安市文物局立即给陕师大发函，责令拆除违章建筑，改善保护条件。但是由于市文物局不是陕师大的直接领导，陕师大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提交一份关于加强唐天坛遗址保护的提案，通过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促使陕师大采取行动，保护天坛遗址。这是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第一份提案，提交时还有些战战兢兢，不知道是否能起到积极作用。

我的这份提案得到提案委员会的肯定，并在《人民政协报》1998年5月18日第二版以《唐天坛遗址在校园内惨遭破坏》为题，发表了 my 的提案的一部分。政协委员提交提案只完成了职责的一部分，如何解决提案中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我认为陕师大忽视唐天坛遗址保护，其主要原因是对这个土丘是否是唐代天坛存在着疑问。这种疑问不仅陕师大的领导和师生会有，社会上很多人也会有。要消除这个疑问，必须创造条件，争取对天坛遗址进行全面的考古发掘。通过发掘揭示的遗址保存状况，文物部门才能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

提交提案后，我通过陕师大的全国政协委员郑庆云教授，找到陕师大的校长赵世超博士和副校长吕九如教授，与他们商谈天坛遗址的保护问题。赵校长本人的专业是中国历史，当然知道唐代天坛的历史价值，他全力支持我们考古发掘。有陕师大的支持，我们考古发掘才有可能。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立项，得到刘庆柱所长的全力支持。我们又向国家文物

局申请了考古发掘许可，并顺利得到了发掘执照。

1999年春，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完成了唐长安城圜丘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工作者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在倒塌的土层下，揭露出残存的台壁根部，解决了唐代圜丘的基本形制（图二一）。唐代圜丘为四层不同直径圆台重叠的露天建筑。第一层（最下层）圆台面径约52.8米，第二层面径约40.5米，第三层面径约28.4米，第四层（顶层）面径约20.2米。每层层高2米左右。各层圆台都设有十二陛（即上台的阶道），均匀地分布在圆台四周，呈十二辰分布。第一层圆台午陛（即南阶）比其余十一陛宽，也比其余十一陛长，是皇帝登坛的阶道。

圜丘为素土夯筑而成，除了修补部分用少量砖填垫外，没有发现砖石包砌的痕迹。圜丘的台壁和台面均用黄泥抹平，其上再抹一层麝合了谷壳和桔杆的白灰面，白灰面厚0.4-1.1厘米。因此，唐代圜丘的外观是白色的。自唐高祖到昭宗近三百年间，十九位皇帝都亲自在这个圜丘上进行过祭天活动，圜丘必然要经过多次修复。考古发掘揭露出来的多层白灰面的叠压，各层圆台直径和圆台高低有所变化，反映出圜丘经过多次小修和数次大修。考古发掘结束后，我们请赵世超校长、唐史学会会长胡戟教授、李健超教授到现场（图二二）。史念海教授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的泰斗，已87岁高龄，被搀扶着登上圜丘的最高层露出欣慰的笑容（图二三）。

唐代天坛遗址的考古发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新华社及时报道，《光明日报》、英文版的《中国日报》等报刊都以显著版面刊登消息。英国的《泰晤士报》、美国考古研究所的刊物《考古学》和北欧《科学画报》均报道了消息刊登了照片。

唐代天坛遗址的考古发掘为保护这一遗址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文物部门马上设计实施了保护工程。保护工程将遗址安全地保护在覆土之下，工程采用唐代的工艺、仿唐的材料，使遗址的外观与唐代相近。四层白色的坛体，12条登坛的陛阶，尽显高贵典雅。目前，天坛遗址的周围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结合城中村改造，遗址东侧的吴家坟村已搬出遗址范围，天坛遗址公园已免费开放。2018年的大年初一，“福佑中华·天坛祭祀”迎春祈福大典，在西安天坛遗址公园内隆重举行。

推动南水北调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是一个重要提案。南水北调工程是解决我国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问题的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2002年12月27日正式开工。南水北调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严重滞后，因为在工程规划阶段和项目建议书阶段，没有充分考虑文物保护问题。南水北调工程上马以后，专家学者多次呼



图二一 隋唐圆丘全景



图二二 赵世超、胡戟、李健超在圆丘



图二三 史念海教授在圆丘

吁抢救保护祖先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南水北调一期工程涉及湖北、河南、河北、天津、北京、江苏、山东七省市，中线干渠线路经过的山前地带和东线大运河段连接着夏商文化、荆楚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等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区域，是中国古代文明最发达的地区，文物古迹极为丰富。其中包括已经发现的湖北郢县猿人、河南浙川下寺楚国贵族墓群、武当山遇真宫、大运河及其相关遗迹在内的一批特别珍贵的文化遗产。地下埋藏的未知古迹更难以预计。考古勘察和文物保护工作是南水北调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

应该是最前期的工作之一。

2005年3月7日胡锦涛总书记到社科届别的联组会，组长王忍之院长和江蓝生副院长安排我发言。我向总书记汇报了当前保护文化遗产的形势严峻，存在的很多问题，特别是南水北调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严重滞后。总书记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会后总书记的秘书要走了我的发言稿，没想到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都在发言稿上亲笔批示。

2005年5月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专委会会同水利部、国务院调水办、国家文物局等有关部门，就南水北调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了先期调研，并提出“关于解决南水北调工程中文物保护经费的紧急建议”专报温总理。

2005年9月全国政协科副主席张思卿率领部分政协委员会同国家发改委、水利部、国务院调水办、国家文物局等有关同志组成联合调研组，对山东、江苏、湖北、河南四省南水北调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并形成调研报告。我有幸参加了全程的考察。

政协的调研报告有力地推动了南水北调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前期考古工作的经费很快到位，文物普查和考古发掘工作加紧进行。我们考古研究所也承担了河南、河北的有关项目，我所邳城考古队发掘了被渠线穿过的磁县北朝墓群63号墓。南水北调工程的考古成果斐然。

我的另一份提案在社会上引起一些争论。

2008年3月9日，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在第十一届一次会议的大会发言时提出在曲阜和邹城之间建立一个中华文化标志城，定位为中国的“文化副都”。我觉得这很不妥，散会时与樊锦诗老师交换意见。她也反对山东省建标志城，并让我从保护世界遗产的角度写个提案。我连夜写了一个提案，认为这个中华文化标志城需要重新论证。我的提案从四个方面阐述建立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不妥，特别强调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多民族一体的。中原的夏商周、长江流域的荆楚文化、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滇文化，以及边境地区的各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碰撞，形成了中华文明。中国的文化遗产，是光辉灿烂的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载体。每一处文化遗产都是人民了解、认识祖国历史文化的最好课堂，也是激发民族自豪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最好基地，都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标志城无论选在何地，都不可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也不可能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广泛认同。这份提案得到114名政协委员的签名。第二天多家媒体报道热议。



2008年8月,我接到国家发改委对提案的答复:“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设想的出发点是力图展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支持”,“在加强现有历史文化遗址保护的同时,抓紧开展中华文化标志城”,“由建规划创意征集,充分做好研究论证,扎实做好项目的各项前期工作,待各项条件具备后再启动具体设施的建设”。也就是说这个项目改为文物保护为先。2009年3月的两会,还有政协委员提出对发改委的答复不满意。2009年12月,孙淑义因涉40亿非法集资和出面安排人事等问题,被免去山东省政协主席职务,并免去政协委员资格。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也就不再提起了。

2012年3月的两会是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最后一次参会,很希望为文博考古事业再做一些事情。我提交了3个有关提案:《关于全面推进丝绸之路跨国申遗工作的提案》《关于建立中国国家考古博物馆的提案》和《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利用必须加强考古学研究的提案》。

考古博物馆是国际上一种新兴的博物馆形态,通过展示考古工作的过程、技术方法、研究思路、成果及其背后的人物故事,从而帮助人们了解考古学及其方法和过程、考古学史和考古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近年来,中国的博物馆发展很快,但大多是历史类和艺术类的,与考古有关的博物馆只有考古遗址博物馆,但遗址博物馆是以保护遗址为主,展陈为辅。史学类和艺术类博物馆一般都不接受考古出土的残片,因此大量考古出土的标本只能尘封在简陋的库房里,人民大众无缘与之接触。例如,1999年我们考古队发掘了隋唐长安的圜丘遗址,出土的遗物虽不多,但有些遗物是从未发现过的。后来西安博物院筹备时来考古所借调文物,点名要隋唐圜丘出土的文物。当时我建议把圜丘出土的所有文物一起借调,但是他们只借调能够上展厅的玉印、陶印等,而一般砖瓦陶片便只能沉睡在考古库房了。如果我们有考古博物馆,考古人完全可以用残破的遗物讲一个完整的故事,给参观者一个靠近真实历史的体验。

反观世界上其他历史悠久的国家,大多都建有国家考古博物馆,展示本国考古学的成就,吸引世界游客。例如希腊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的考古博物馆、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和埃及国家考古博物馆等等。

现在距2012年提案过去了十一年,中国国家考古博物馆在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的基础上建立了。陕西省考古博物馆已经开馆,受到大众的欢迎。作为提案人,我很兴奋。不过,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如何把博物馆办得有特色、吸引人,如何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是摆在考古人面前的新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已经给我们指出了方向:“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具有特殊作用。”

另外两个提案的落实情况不错。2014年6月,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一天山廊道的路网”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目前已有几十所大学设有考古专业和博物馆专业培养文博专业人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业人员编制增加了一倍,各地方考古所的编制也有不同的扩充。

社会上有流言,说人大是橡皮图章,政协是花瓶摆设。然而,在做政协委员的十五年中,我体会到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委员在讨论时都实事求是,观点明确,畅所欲言。委员们的提案也得到认真的答复,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考古工作者参政议政有优势,因为我们不是只在书斋中做学问,下田野就要接触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了解大众的需求,善于与人沟通。求真求实是考古人的初衷,在参政议政中讲实话,重解决问题,也是我们始终坚持的。

2013年春,我离开全国政协,年底收到国务院的聘书,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馆员,李克强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给我们新馆员发聘书。这意味着我在这个新的平台上继续为我国的文博事业发挥作用(图二四)。

**安家瑶:**作为丝绸之路申遗专家,你对“丝绸之路:长安一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做过怎样的努力?取得了怎样的成果?

**安家瑶:**2014年6月“丝绸之路:长安一天山廊道的路网”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中、哈、吉三国跨国联合申遗项目,也是世界上第一段列入遗产名录的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这次申遗成功是上到国家统筹、下到各地基层、群众共同参与、努力的结果。丝路进入世界遗产名录,不仅有利于保护好沿线地区的文化遗产,带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水平的整体提升,而且对于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软实力,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因此在前期的准备过程中,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来深入研究遗迹的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相关遗址保护管理的法律条文以及遗址本体保护、环境整治情况。此外,由于是跨国申报,所以当中还涉及许多国际层面上的协调工作。在申遗思路,我们也比以往有所突破,过去的申遗项目都是单个的遗址,而丝绸之路是以一条文化线路来申遗,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让



图二四 2018年与国务院参事邓小南、邓小虹考察黑城遗址

一批文化遗址同时进入名录，提高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与效率。当然，这次申遗也是有遗憾的。在2007年，国家文物局确定的丝绸之路联合申报世界遗产第一批申报项目推荐名单中，共有48项文化遗产，但到最后，仅有22项入选。各地遗址保护程度不一样，地方政府和人民的申遗积极性也不尽相同，这直接影响到了遗址最终能否入选。

这次申遗过程中，河南省的工作可圈可点。最初专家组在讨论丝绸之路申遗备选名录时，并没有考虑将河南省纳入考察区域，但是2006年国家文物局、有关省份文物局及一些文博专家在吐鲁番召开“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协商会议”的时候，河南省代表却“不请自来”。他们在会议上主动提出参与申遗，并且推荐了崤函古道石壕段、汉函谷关等遗产点。在全国初步确定的申遗项目中曾一度缺乏道路、关口类的遗迹，河南申报名录中的这两个遗产点正好弥补了之前预备名录的缺陷。后来，我们去新安县汉函谷关考察时，发现函谷关附近虽修建了铁路和国道，但依然保存了部分汉函谷关的关门、关墙、烽火台等遗迹，非常珍贵，而且附近老百姓申遗积极性很高，他们自发地组织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图二五）。2013年3月，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22处遗址点入选首批申遗点名单，汉函谷关名列其中。河南省从最初没有申遗点被考虑，到后来一次入选4项，固然因为这些遗产点对丝绸之路来说意义非凡，同时也反映了河南省对申遗以及申遗之后所带动文化复兴的深刻认识。除了河南，我们在考察汉函谷关、张骞墓等文化遗址时，也能感受到当地政府与百姓对于申遗工作的热情与积极性。汉函谷关附近村民自发组织遗址保护与宣传活动，而张骞墓被张家的后人世代守护，在当地营造了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这些都令我很感动。

申报世界遗产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利益相关者的态度。地方政府和民众对申遗工作的配合与支持度

非常关键，因为申遗后期还涉及环境整治、考古发掘、整体保护等相关工作，如果没有当地政府和百姓的支持，这些工作是无法开展的。

目前我国正在筹备海上丝绸之路的申遗工作。与陆路申遗和大运河申遗的过程相比，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的道路还很漫长。日本、韩国、印度等国都在积极准备海丝申遗，而且在一些基础研究方面已经走在我国前面，所以尽快推进海丝申遗已经是迫在眉睫的要事。当前的海丝申遗工作包括以下几个重点：一是在国家层面统一开展主题研究，尽快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定义、基本内容、申遗要素、申遗战略和工作路线，形成国家共识，乃至国际共识；二是引导各地尽快熟悉遗产点能够纳入海丝申遗范畴的标准，明确对海丝申遗保护、管理、监测、展示等方面的要求，加强对海丝遗址的保护；三是加强基础的考古学术研究，从而指导具体的展示和世界遗产论证工作；四是充实各地海丝遗址研究专家队伍，解决海丝遗址保护、展示的经费问题等。此外，建立高层协调机制也是决定海丝申遗能否成功的关键一步，因为推进海丝申遗这样复杂、综合并且涉及的重大文化项目，单靠部门间协调，很难有效实现国际、国内战略的目标。

海上丝绸之路与陆路互为补充，共同见证了东西文明交流与民族融合的灿烂历史。海丝申遗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因此，我希望各参与方能在国家层面的协调下，尽快推进，掌握主动权，早日实现申遗成功。

**安家瑶：**考古界同行说你是国际型学者，你能讲一讲你是如何走上国际舞台的？

**安家瑶：**首先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的机遇。我32岁才踏入学术研究的大门，正赶上改革开放的时代，国际学术交流频繁。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了丝绸之路沙漠绿洲线路的考察。这次考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整体研究”启动的第一次考察。7月20日从西安出发（图二六），8月19日抵达喀什，之后飞乌鲁木齐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考察队本身就是一所大学，参加考察的18个国家33名学者，国际学术讨论会又邀请各国知名学者50余人。考察队有两个队长，中方队长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徐苹芳教授，外方队长是巴基斯坦达尼教授（图二七）。我有幸参加了考察全程，结识了国内外很多知名学者。古玻璃的课题是世界性课题，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多国学者访问考古研究所。1981年春，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布里尔博士携女儿来访，夏鼐所长安排我接待。





图二五 2007年考察汉函谷关门楼

布里尔给夏先生、卢兆荫先生和我在北屋前照了一张合影(图二八)。布里尔博士化学出身,在康宁玻璃博物馆研究古玻璃一辈子,对中国古玻璃很感兴趣。我1988年访问康宁时,他将这张珍贵的合影送给我。布里尔后来多次访问中国(图二九)。1986年德国考古研究院的魏沙彬博士访华,她热爱中国文化,长得又很漂亮,像明星一样。所里安排会德语的黄其煦陪她在北京参观。她还计划去河南、江苏各地,王仲殊所长派我陪她去。在旅途中,我们成了好朋友(图三〇)。她回德国后帮我申请到德国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基金。另外,日本学者谷一尚、韩国学者李仁淑都对古玻璃有深入研究,也是我终身的朋友(图三一)。因此,我多次有机会到德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国访问,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研修半年,在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研修3周,拜访了很多玻璃研究大家,提高了我的研究水平。我对法门寺地宫等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的研究都是在海外完成的,在海外也发表了一些论文,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篇:

“*Observations and Problems in Research: The Contemporary Glass Bead Industry of Northern China*” *Beads* 2 (1990), pp.5-13.

“*Early Glassware*” Trans. By M. Henderson.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no.12 (c.1987).

“*Dated Islamic Glass in China.*”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5 (1991), pp.123-137.

“*Glass Trade in Southeast Asia*” *Ancient Trades and Cultural Contacts in Southeast Asia* pp.127-138, The Office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Commission, Bangkok, 1996.

“*Glass Fragment from Yangzhou*” *Proceedings of XV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Glass Vol.6*. Beijin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s, 1995, pp486—490.

“*Glass Beads Found at The Yongningsi Temple*”, *Journal of Glass Studies* Vol.42, 2000, pp.81-84.

“*Glass Vessels and Ornaments of the Wei, J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Periods*” *Chinese Glass*, Edited by Cecilia Braghin, *Orientalia Venetiana* XIV (2002), pp.45~70.

“*When Glass Was Treasured In China*”, *Silk Road Studies VII: Nomads, Traders and Holy Men Along China's Silk Road*, pp.79~94, Asia Society, Brepols, 2003.

“*The Art of Glass Along the Silk Road*”, *China Dawn of a Gold Age, 200-750AD*, pp57-66,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2004.

“*Glasses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Found at Datong*”, *Ancient Glass Research along the Silk Road*, editors Gan Fuxi, Robert H Brill, Tian Shouyun, pp379-386,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Singapore, 2009.

“*Glass Vessels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 Found at Guangzhou.*” *Glass along the Silk Road*, pp177-182, RGZM – TAGUNGEN, Band 9, Mainz, 2010.

“*The Development of Archaeology in China: A Ninety-Years Journey*”, *Unearthed: Rec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from Northern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41-164).

“*Ancient Glass Beads of China: 600BC-600AD,*” *Journal Borneo International Beads Conference 2017*, pp Kuching, Malaysia.

由于中国考古新发现有玻璃,我有机会参加很多国际学术讨论会,任亚洲玻璃史学会常务理事(美国)、国际玻璃大会第十七届技术委员会理事。

中国的田野考古也是非常吸引国外眼球的。我主持的大明宫含元殿第二次考古发掘就是中国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的项目,日本的信托基金为发掘和保护工程提供经费保障。在发掘过程中教科文组织多次派专家现场检查、指导工作。德国考古研究院的院长赫尔曼·帕辛格也到过发掘工地,并亲自修改我写的英文提要。2000—2004年我们考古队与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合作发掘大明宫太液池遗址。1999年我幸运地获得德国考古研究院的通信院士的称号。2004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第26届大会和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CIPSH)第27届大会,选举我为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副主席(2004—2008)。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和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的两个重要组织,办公地点就设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楼里。在这个平台上,我多次赴巴黎开会,讨论文化的多样性,宣传中国的考古成果。2006年赴埃及亚历山大参加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第28届大会,在两组织联合召

开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中的新范式研讨会，我从考古学出发以“记忆、历史与国家”做了发言（图三二）。2008年南非开普敦召开的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第29届大会上，我的发言主要宣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取得的成绩，让世界了解中国。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学术舞台。掌握话语权、制定相关规则，是我们当代中国学者的责任。

**安家瑶：**你从老一代考古学家手中接过接力棒，一千就是三十多年，如今你已退休，把接力棒传给了下一代人。考古事业就是这样薪火相传，一代又一代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你对新一代的考古学者们有何期望和寄语？

**安家瑶：**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它不会成为很热门的专业，所以在宏观层面，考古学科的发展依赖于国家经济的强盛和公众文化水平的提升；从微观来看，干考古则需要兴趣作为动力，更重要的是要有踏实肯干、吃苦耐劳和探索的精神。我很高兴看到像留守女孩钟芙蓉这样忠于理想、勇于追梦的年轻人，也为樊锦诗师姐等考古学者能够成为年轻人的榜样而自豪，这不就是考古精神的薪火相传吗？

过去考古的工作环境确实比较差，记得1983年秋冬，发掘大明宫翰林院遗址我们住在麟德殿遗址上的简易房，天气已经寒凉，但我们睡觉依然要搭蚊帐，因为很多老鼠在顶棚上跑来跑去，不停地掉土渣。我们所还有位女同事在三峡考古时被老鼠咬伤了耳朵。不过，因为早年我曾在北大荒生活过，在经历了那段艰苦的岁月后，考古工作中的辛苦对于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国人讲究先苦后甜，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考古工作带给我的成就感与乐趣远远超过了其中的辛苦。1988年我曾参加过美国爱得荷大学的暑期考古项目——银城发掘。考古队没有厨师，各自解决自己的吃

饭问题。发掘的三周，我靠在博伊西超市买的方便面、面包、罐头、水果充饥。美国考古发掘的方法与国内一样，先布探方，不过探方很小，10英尺×10英尺，每人负责一个探方。在国内考古发掘总是要雇人挖土，哪怕是大学生田野实习。在银城的考古发掘却没有雇一个人，探方中的土全靠自己用铁桶提出探方。我和美国考古人员都是在落基山上搭帐篷过夜的，白天热得流油，夜里冷得无法入睡，但是头枕满天繁星，耳边传来牛的哞哞声，也是人生难忘的经历。通过在美国考古，我认识到美国的考古人比我们还能吃苦。

现在考古工作的条件和环境都好多了，国家和地方财政也为考古发掘和研究提供了很多的支持。但考古仅靠硬件条件的改善和财政的支持还是远远不够的。考古事业需要大批优秀的考古人才。

对于考古学的年轻一代，学界对他们鼓励与期待的声音一直都在，我就说一点个人的体会吧。我希望未来打算从事考古事业的人们能够重视田野考古。现在考古学界存在一个问题：考古专业的学生毕业后，愿意长期从事基层田野工作的并不多。陕西省麟游县位于渭北高原丘陵沟壑区，历史悠久，有丰富的遗址和遗物，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就是我们在麟游发掘的。为了招募考古人才，2020年陕西省公务员招聘时，特意设置岗位为麟游县招聘考古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遗憾的是，博物馆的职位有人报名，但是这个考古职位却没有一个人报名。这个消息真让我感到沮丧。虽然现代信息技术、科技手段、交叉学科理论能够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一定的优势，但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考古研究必须立足于实物，从小处着眼，务实求真。田野考古一直是考古研究的基础，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都是来自田野发掘。离开了田野考古，考古学是很难再向前发展的。经受住了田野作业的风吹日晒，才能达到学术前贤所坚持的青灯残卷、耐得冷寂的治学境界。



图二六 丝绸之路考察从西安出发



图二七 徐莘芳教授与达尼教授





图二八 与夏鼐、卢兆荫合影



图二九 1990年与布里尔、韩伟在法门寺



图三〇 2011年与魏沙彬博士在西安博物院



图三一 2007年与李仁淑博士在庆州



图三二 2006年在埃及金字塔

心  
路  
历  
程  
薪  
火  
相  
传

2020年9月底，我刚从隋仁寿宫唐九成宫4号殿址考古发掘现场回京，就听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指示，感到非常振奋。习总书记说：“要积极培养壮大考古队伍，让更多年轻人热爱、投身考古事业，让考古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这对于考古学界既是极大地鼓舞，也是殷切的期望，更让我们感受到肩上担子的重量。如何能将习总书记的讲话落到实处，让中国考古后继有人，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希望寄托在新一代考古学者的身上。

安家瑶：谢谢姐姐，你介绍的这些让我对隋唐考古和古玻璃器的历史有了兴趣，请你推荐几本书让我读一读。

安家瑶：我的成果不多，研究古玻璃的论文多发表在各种书刊中，只出版了一本小书《玻璃器史话》，多年前和你一起编写了《世界古代前期科技史》。考古的成果主要是考古报告，如《隋仁寿宫唐九成宫考古发掘报告》（第二执笔）、《青龙寺与西明寺》、《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1995—1996年发掘报告》、《陕西西安唐长安城圆丘遗址的发掘》等。目前，中华书局正编辑出版馆员文丛。我的论文集《唐城考古·丝路玻璃》也将出版。论文集分三部分：考古篇、丝路玻璃篇和文化遗产保护篇，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总结。

2020年，我们姐妹整理出版了《安志敏日记》，为中国考古学史增添史料，也是对父亲的感恩。遗憾的是没有收进1966年—1976年日记。这段时间里父亲去河南干校，从干校调回北京准备《考古学报》和《考古》的复刊，在故宫武英殿筹备出国文物展，与周一良等访问埃塞俄比亚，和一些考古调查工作。这些工作也是中国考古学史的重要材料。希望不久的将来，有机会将父亲这十年的日记出版。

谢谢采访！

（责任编辑：谢 绮）